

編輯學者化：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真問題

葉娟麗

“編輯學者化”成為話題，還是 1980 年代中期的事情；此後，它也一度成為熱門，紛紛出現在以編輯作為寫作主體的論著中。但無論如何，此前關於“編輯學者化”的討論，其廣度與深度都是非常有限的，直至 2018 年朱劍主編在《清華大學學報》和《澳門理工學報》幾乎同時發表的兩篇雄文橫空出世。其中一篇文章從梳理中國學術期刊史的角度，對近 40 年來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做了入木三分的刻畫，而焦慮的原由之一正是所謂的“編輯學者化”；另一篇文章則圍繞著“編輯學者化”這個被討論了 30 年的話題，進行了抽絲剝繭般的回顧與反思，進而探求學術期刊編輯擺脫焦慮的可能性。借助於互聯網帶來的傳播優勢，這兩篇文章的核心思想幾乎傳遍了中國學術期刊圈的每一個人，直擊多年來大家心中隱而未發的身份焦慮，並將“編輯學者化”這樣一個本不應成為問題的問題，再次拋到了大家面前。

一、什麼編輯，哪種學者，何謂學者化

確切地說，“編輯學者化”並非一個規範的學術命題，從既有的討論來看，它並無確定的內涵與外延，因此除了引發情感上的共鳴外，關於“編輯學者化”的討論很難達成廣泛的共識。

首先，關於編輯的界定。話題最早出現時，編輯主要指向文藝作品的編輯，隨後擴展至藝術界的其他行當；但有趣的是，真正出現身份焦慮並且被廣泛動員起來參與編輯學者化討論的，主要是學術期刊的編輯，而其中參與最多的是各大學綜合性學報的編輯。圖書編輯，包括最早的“編輯學者化”討論的當事人即文學作品的編輯，逐漸被外在於“編輯學者化”的討論。

其次，關於學者的界定。相比較於編輯的概念，關於學者的定義隨意性更大。從理論上，並沒有成熟的指標體系幫助我們鑒別學者；在實踐中，關於某人是學者或不是學者的判定，更是莫衷一是。根據《辭海》的解釋，學者的內涵，一是指求學的人，做學問的人，如《孟子·滕文公上》：“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荀子·大略》：“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二是指學術上有一定造詣的人，如《舊五代史·史匡翰傳》：“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受業焉。”而《辭海》的這兩層意思，在實踐中本身就是矛盾的。求學的人並不一定就能夠最終成為學者，至於學術上有無造詣，更容易陷入主觀之爭。

還有，關於學者化的界定。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只是抽象地提學者化，並沒有涉及學者化的更多具體方面，使得“編輯學者化”更容易流於一個情緒化的口號，而不是可操作的行動綱領。

鑑於概念上的互不認同可能帶來討論上的誤解，所以，本文特別界定一下這裡需要討論的“編輯學者化”，是一個完全中國語境的概念。其中，編輯特指我國的學術期刊編輯；學者，特指科研院所的專職研究人員和教師；而學者化，則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具備與供職期刊涉

及學科相匹配的學術鑒賞能力與學術研究能力，二是享有專職教師或者專職研究人員的權利與待遇。概括起來說，編輯學者化，就是指專職從事學術期刊編輯的那部分人在能力、身份、權利與待遇等方面與專職從事研究的教師或者研究人員相同。

二、編輯學者化：一個理論上的假問題

不言而喻，學術期刊的編輯，必然是以學術為志業的。因此，學者化，應當是學術期刊編輯的題中應有之義。換言之，從理論上講，編輯學者化，是一個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或者乾脆說，這是一個假問題。

首先，從學術期刊的基本屬性來看。作為一種基於固定周期的連續出版物，學術期刊上登載的內容主要是經過同行評議的學術研究成果，這些成果可以是某一特定專業領域的，也可以是跨多個專業方向的。但無論其具體內容是什麼，學術期刊作為“展示學術成果的平台”和“學術思想的儲存庫”，評價與甄別學術研究成果是其第一要務。經由這種學術成果的創造、遴選、甄別和加工，學術期刊將學術生產各環節的參與者，如前端的研究者、中端的編輯以及後端的讀者聯繫起來了，大家共同營造一個專屬的學術共同體。在這一個特定的學術共同體中，編輯與學者或者說專職研究者分屬於學術生產的不同階段，在服務學術這個共同目標上，只有分工的不同而並無身份的高低貴賤之分。在這個意義上，編輯與學者之間不可能存在涇渭分明的界限，更不可能出現“編輯學者化”的問題。

其次，從學術期刊的發展歷史來看。作為公認的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無論是法國的《學者雜誌》(*Journal des Scavans*)還是英國皇家學會的《哲學彙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都是由學者負責編輯出版的，編輯即是學者，學者充當了早期的編輯，這種傳統甚至一直延續到今天。同理，我們再看早期中國的學術期刊，很多也都是由著名學者主辦的，這些學者，既是學術期刊的主辦者、編輯者，也是學術研究的承擔者，是撰稿者，是學術期刊內容的提供者。如在中國現代史上承載著諸多政治與社會意義的《新青年》，其編者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同時也是雜誌內容的提供者，都是各自領域的傑出研究者。這樣的情形很多。如著名文學家、教育家和語言學家葉聖陶對自己的定位是“我的職業是編輯”，在他的心目中，編者、學者並無區分。還有中華書局前總編輯傅璇琮先生。一生都是專職編輯的傅先生在學界同人筆下的形象卻是我國著名的唐史研究專家，他對學術的貢獻不僅在於以編者身份完成的古籍整理以及為古籍整理出版立下的法則和規範，也在於他以文獻考訂的方式對中國古代文學所做的獨特研究。追根溯源，學術期刊從一開始就是由學者來編輯的，編輯即是學者，學者充當了編輯，中外學術期刊發展史都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從今日學術期刊的發展趨勢來看。眾所周知，在學術期刊大家庭中，像我國大學學報這類綜合性學術期刊只是特殊時代的產物，其發展日漸式微，而當前真正引領學術的是以學科為導向或者以問題為導向的專業性學術期刊或者學術集刊。這類期刊專注於某一個學科或者某一個研究方向，更容易凝聚起研究力量，因此發展勢頭強勁，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有望成為學術期刊發展的基本方向。而這類期刊，一般都是依託於某個或者某些特定的學術機構，由一幫志同道合的學者聯合創辦的，在辦刊過程中，學者兼做編輯，編輯同時兼有研究者身份，並不存在編輯與學者的嚴格分野。

總之，從理論層面，編輯與學者在某一個學術共同體中，協同完成學術生產與加工等事務，

不應當存在身份、地位的高低貴賤問題。從歷史來看，最早是學者創辦了學術期刊，學者同時又是編者，他們事實上也不存在嚴格的編輯與學者的身份對立。而且，這種傳統正在一些新創辦的專業期刊或專業集刊中得到繼承與發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編輯學者化”是一個不應成為問題的假問題。

三、編輯學者化：一個現實中的真問題

理論上的假問題，並不等於不能成為現實中的真問題。誠如朱劍主編文章中提及的，編輯學者化，不僅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持續討論了 30 年且仍然造成很多學術期刊編輯身份焦慮的熱門話題。由“編輯學者化”帶來的困擾以及學術期刊編輯的身份焦慮，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不難見。

首先，編輯與學者在身份、待遇方面的嚴格界分日益制度化且有逐漸固化的傾向。1978 年教育部頒發的《關於辦好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的意見》首次規定“學報應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部分教師與科研人員因此轉崗成為專職編輯。1988 年，新聞出版署發佈的《期刊管理暫行規定》規定辦刊前提條件之一就是要有“專職主編及一定數量的專職編輯”，從而使得專職編輯成為了辦刊的法定標配。至此，學術研究隊伍出現細分，從制度上開始出現專職編輯與教師、研究員等身份或角色的界分，隨後的職稱評定等一系列制度的助推，使得介入期刊編輯出版的學術團隊的權利和物質待遇等，開始獲得不一樣的制度甚至法律認同。比如說，在職稱評定時，開始出現所謂的編輯系列、教師系列、研究員系列等，不同系列的職稱評聘遵循不一樣的標準，當然在工資、退休待遇、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等諸多事務上，編輯與教師、專職研究人員也不能同日而語了。至此，編輯才真正完成與學者的角色分化，並且這種分化開始出現固化的趨勢。在有些地方，這種分化體現為編輯失去兼職從事教學的資格，即使擁有正高職稱與博士學位，即使有強烈的個人意願和充足的任職條件，編輯也無法參與相關專業研究生的培養與教育工作，如吉林大學。在有些地方，這種分化體現為編輯工作績效不按學術規律進行考核，而是以每天在辦公室守滿 8 小時為原則，如武漢大學。在有些地方，這種分化甚至可能意味著對編輯身份的羞辱，如北京某著名高校的 S 教授因為性騷擾嫌疑而被舉報，最後學校給他的處分是將其職稱由教師系列（的教授）降為編輯系列（的編審）。很顯然，在這個學校的制度設計中，編輯與學者不僅不能平起平坐，甚至在德行要求上編輯都比學者要低人一等。諸如此類，在目前我國高校學報系統，編輯與學者的制度劃分可以說已經是根深蒂固了。

其次，很多學術期刊的編輯在主觀上日益強化自己不是學者的標籤，並且逐漸自覺地外在於學術。根據身份認同理論，人們對自己社會身份的確認，往往是在與其他人的互動當中實現的，它屬於客體關係的結果，因此當外在的不當影響足夠強大時，人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有可能出現歪曲。當制度規範與法律規範一再刻畫某種專職編輯的強烈印跡，並且突出地強調編輯與學者在學術責任、學術權利、身份待遇方面的差異時，一部分編輯開始主動地退出學術創作領域，放棄自己的學術責任，自外於學術，長此以往，就從主觀上慢慢喪失了介入學術的慾望，並且從行動上會無意識地去做一些迎合性的選擇，最後結果就是使自己在學術能力方面與學者的差距越來越大。

再次，很多學術期刊的編輯客觀上喪失了參與學術的能力，逐漸淪為純技術性的編輯或者編務。我國目前學術期刊編輯隊伍魚龍混雜。近十年內已經退休的那批編輯，多數是在 1980 年代從其他崗位轉化而來，其轉崗的原因，或者是主觀上不再願意從事學術研究，或者客觀上無法勝

任進一步的學術發展。這批編輯主導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黃金 30 年，並且確立了中國學術期刊發展的一些基本規則，其中之一就是恪守專職編輯的本份，不介入學術，做純技術性的編輯。與此同時，學術期刊編輯的制度改革也一直在不斷探索當中，其中之一就是專家雙向匿名審稿制度的推行。這種將學術審查權力外包的制度設計，更加強化了學術期刊編輯作為稿件收發中介和加工校對的角色定位。儘管有的期刊編輯仍然是學術策劃與創作的主體，但更多的期刊開始將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學術創作部分外包而只專注於編輯出版的技術部分，編輯隊伍中出現了更多的職業化或者純技術性編輯。久而久之，編輯們一方面從主觀上不再有參與學術的追求，另一方面，從客觀上，編輯日益執著於瑣碎的技術工作，而逐漸失去學術鑒賞能力，更別說學術研究能力了。儘管仍然有相當一部分編輯固守在學術研究的第一線，但不得不承認，多數編輯開始將自己的角色定位於一個純技術的編務，離學術越來越遠，更別提什麼學者化了。

很顯然，編輯與學者的身份差別在當前我國學術期刊中不僅是一個制度化的規定，更是一個現實的客觀存在。而且，這種身份差距並非對等的關係，無論是制度規定還是實踐操作，編輯都是一個遠低於學者的身份設計。因此，彌合二者之間的差距，追求編輯學者化，就成為了一個不折不扣的真問題。

四、編輯學者化：究竟是誰的焦慮

編輯學者化，30 年的討論並沒有解決我國學術期刊編輯與學者的角色緊張，反而一再帶來編輯們的身份焦慮。根據身份認同理論，當一個人從原來的身份改變成外在環境強加的另外一個身份時，他就會經歷強烈的思想震盪和巨大的精神磨難，出現身份認同危機，如那些進入編輯隊伍中卻仍然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他們在承擔繁雜的編輯事務的同時，也並沒有放棄科研甚至教學任務，在學術共同體中，他們的角色與專職教師、專職研究人員並無二致。但當其從事學術研究的實踐遭遇外在的制度限制時，當其學術研究的成果因為編輯身份而得不到學術共同體承認時，當其在物質待遇與精神榮譽等方面與學者存在近乎侮辱性的差異時，當其游走於編輯與學者身份之間而時間、精力不濟時，就會經受無形的情感衝突和心理壓力，經歷某種希冀與痛苦並存的身份焦慮。因此，編輯學者化，首先是那些懷有學術理想的期刊編輯的焦慮。

當然，編輯學者化，更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的焦慮。除了平台的展示功能，學術期刊還承擔著學術“交流與對話”的重要功能。純技術性的編輯也許能夠將學術成功如期如願地展示出來，但交流與對話則遠超乎於對這些編輯的角色期待。無論是通過學者辦刊也好，還是提升編輯學術層次也好，對學術期刊功能多元化的理想要求與期刊編輯日益技術化的現實之間的矛盾，使得學術共同體關於編輯學者化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可見，編輯學者化，從主觀上講，反映的是我國部分學術期刊編輯尋求學者身份而不得的苦衷；從客觀上講，則體現了目前很多學術期刊逐漸喪失學術品位、盲目追求形式或者技術美的尷尬。而造成這種兩難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於現行的職稱評聘制度、期刊管理體制、學術評價包括期刊評價體制嚴重違背了學術發展的內在規律，人為地在編輯與學者之間製造了一條體制上的鴻溝。因此，如何彌合這一體制鴻溝，最大限度地解放束縛學術生產力的那些制度要素，實現編輯學者化，可以說，既是那些有志於學術的編輯的心聲，更是整個學術共同體的期盼。

（作者係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劉澤生〕